

《中国翻译考察（1966-1976）》述评

贾洪伟

（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所、北京市，100089）

摘要：从史学写作规范和专业角度，按照章节顺序，对中国文革时期翻译的断代史新著《中国翻译考察（1966-1976）》，进行批判式分析和评述。

关键词：文革翻译史；中国翻译史；史学写作

中图分类号：H059

近日偶然在图书馆碰到李晶博士的专著《中国翻译考察》，改编自自己的博士论文，是探讨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翻译状况的第一篇博士论文，也是第一部研究这一特殊时期翻译史学的理论专著。由于自己转行做语言史学和翻译史学能看见有人做这一时期翻译史研究，很是欣喜。对历史课题，特别时政治意识形态很强的历史时期，无人愿意问津，原因很简单，做历史课题研究费时费力不说，成果少且没有经济利益，也不大受人戴见。

本书由崔永禄作的序、作者前言、主体、附录二则、参考文献、后记和作者简介组成。为了便于了解各章节所涉及的问题，故采用分章评述的方式进行。本著共分六个主体章节，即：绪论、文革时期中国翻译概貌、文革时期中国翻译的“人本”研究、文革政治话语霸权下的译本特色、翻译的政治、结语。

第一章绪论交代了文革翻译史研究的缘起、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与方法。在绪论的研究现状部分，作者的摘要工作做得比较足，甚至太多，评述不足，两者比例严重失调；研究方法上，理论与方法略显混乱，其中质量量化分析很适用，但西方翻译理论似乎与中国当时的文化现象并不相当，没有考虑到不同理论的背景环境和适用范围，做史学研究最好运用史学研究方法，但在本著中尚未得见。此外，第一章还有几个与措辞和逻辑有关的小问题，如“文革”极“左”思潮在20世纪60年代初即已露出端倪（2008:2），是什么导致的呢？首先是翻译数量少。据笔者统计，……，翻译出版量呈历史最低点（2008:4；6）是与哪个阶段的历史相比较呢？汉朝？明朝？元朝？民国？还是建国初期？不得而知！这一时期，……的翻译队伍和“集体翻译”的方式应运而生

（2008:5）试问集体翻译是这个时候出现的么？隋朝就有吧？但这两者性质一样么？一个宗教，一个政治，但两者都受当时政治意识形态影响，而外在表现和文化影响有所不同：一个较积极，一个较消极。最后，在本书19页有霍恩比的著作，运用的是二手资料，这本书国内还是很长见的，做史学最好用第一手资料。

第二章（“文革”时期中国翻译概貌）先交代了这一历史时期翻译所受影响的三种局势（政治局势、外交局势和文艺动向），然后描写了译作出版的总体状况和翻译活动的趋势特点。从这部分的阅读，我发现这部著作在史学著作元语言和史学著作写作范式等方面的问题，虽然都不是很严重，但毕竟是问题，那就需要给予重视。史学著述写作中，最好不要过多地运用成语和俗语，当然引用除外，我说的是元语言，即用于阐述史实的语言，本著中，不免出现这种现象，如：凌驾、登峰造极（2008:46）等，此其一；史学著作的任务是挖掘史实，特

别是表面现象的历史动因，通常不止一两个，对其进行阐述、分析和解释时，最好采用客观语言基调，不要主观成分与客观成分杂糅在一起，有损于史料的价值，这一点不但在本部分，其他部分也很明显，此其二；史学著作中，最好不要个人意识形态过于浓厚，以免产生个人主观意识形态的倾斜，其具体体现则在语词的运用，譬如就畸形（2008：34）来说，以什么作为评判的参照物？对这个历史阶段来说怎么样是不畸形？不畸形的历史应该是什么样的？历史终归是历史，是过去存在的存在物，对此，我们可以运用移情的方式，去与历史中人去对话，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特定对象的历史成因，进行挖掘、分析和解释，使得人们对这一时期的时间有个系统而清楚的认识，作者可以给予客观地评判，但不允许有个人意志的参杂，此外，还有“极度凋零”（2008：35；36；44；54等）和后来的“蒙上”（2008：110）、“语言暴力”（2008：110）等等，此其三；史学著作的写作大多以描写、叙述为主，后加解释、分析、评论，以再现历史，使读者对这对历史能有个相对清楚的认识，此其四。

关于史学著述的写作范式，在本部分体现得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可以有如下三点：一，量化分析后没有对历史现象进行历史分析和解释，因而历史问题就变成了苍白的翻译问题，即质量化的理论实证问题，但是假设何在呢？二，史学著述写作的逻辑问题，在44页第三节第一段第一句，作者说“‘文革’时期主流话语体系只讲马克思主义一种资源”似乎不符合当时历史事实吧？记得第三章有引用说“要把出版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这说明什么呢？马克思主义的根，能否代表毛泽东思想、列宁思想、斯大林主义的枝叶呢？三，史学著述应能提示后人某段历史时期所出现的开创性格局、首创及其对历史的影响和意义，就文革时期翻译史来说，它也有首创，也有开创性格局，更有独特的历史影响和意义，但是什么呢？

第三章（“文革”时期中国翻译的“人本”研究）研究了翻译的委托和组织者---“赞助人”、翻译的主体---“译者”和翻译的目标受众---“读者”。从整部作品来说，这部分的分析很重要，是体现这个历史时期翻译与政治关系的重要体现，尤其独特的历史色彩，是中国所独有的，即使当时苏联有，也是有所不同的（参见笔者苏联语言学汉译史分期，待发）。然而作者所用的是比较文学中文化派倡导者勒菲弗尔的“翻译赞助人”理论，来分析这一时期中国翻译的实施/布施主体（翻译者为操作主体）。运用这个理论也无可厚非，但首先要经过厘定，说明东西间用法的不同或是使用环境的殊异，然而作者没有，而是在本章第二节“翻译主体”的“译者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和赞助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尾声才厘定了“何为赞助人”，即：“赞助人是委托翻译、翻译出版并且保证其能够发行的人。赞助人是译者的文本和他希望能够看到其作品的读者之间的联系纽带。赞助人制约着译者的意识形态空间。如果译者不能将自己限制在赞助人所能接受的范围内，那么，其翻译有可能无法达到其期待的读者，或者充其量，其翻译只能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让读者接受。”（2008：76）

如果仔细考察西方翻译情况，我们发现西方翻译关系中，大多是出版商担当赞助人角色，而且翻译者是自愿加入这一翻译关系，而后才受到赞助人，或曰翻译关系的束缚。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存在委托人而不存在出版商的翻译关系，通常这种翻译关系产生的译作为内部翻译，或在某一特定范围内使用或流通，这时委托人可以担当赞助人。不管发生那种情况，首先译者是自愿介入这一翻译关系，然后才受制于这种游戏规则；其次，译者受制约是因翻译关系中的经济因素所导致的，譬如林语堂在美国做翻译，他的赞助人是赛珍珠，为销

售额，赛对林进行约束，因为经济因素林语堂受约束于赛氏，那么，在翻译活动之前，林语堂是自愿与赛氏合作的。然而，文革时期的中国，这种翻译关系是完全不同的，译者承担的是政治任务，是废物利用的角色，参与翻译工作，大多没有自由、没有选择，更没有经济因素涉入，所以说只有政府、只有政治，出版社、读者、译者都没有自由的决定全力，是呈现全程受约束的，这是文革时期中国翻译史的一个典型的特点。正是由于作者无用了赞助人理论，这一历史时期的翻译史特点被抹灭了，因而所产生的性质就不是翻译史研究而是翻译理论研究了。

本章中部分内容完全可以拿来否定西方式赞助人在文革时期的存在，例如：“‘文革’时期，类似这样大字本外国历史书，以及一些外国科学书，大多都是在毛泽东的阅读下，作为政治任务翻译出版的，”（2008：62）这里毛泽东是委托人么？是出版商么？如果不是，那么，他是赞助人么？如果他是皇帝的角色，他肯定是，那么，他是皇帝么？“‘文革’时期，翻译大多作为一项指定的政治任务，很少有个人的译作出版，大多数译作都是在高度组织下由翻译小组集体完成的”（2008：65）这里面有赞助人的身影么？倒是能看出翻译主体的线索（个人、集体、组织）。那么，文革时期有没有赞助人个案的出现呢？应该有，但不应该占主流。譬如，“在‘文革’第二阶段，由尼克松访华带动……有空的时候，翻译几篇文章，寄给上海的一家译刊，竟然发表了。”（2008：66）其中，期刊可能算作赞助人，可是翻译过程中，他们有约束和赞助的关系么？没有，而更多地应该看做自由翻译。

这部分是典型的运用西方翻译理论来套中国的现象，而不管政治意识形态、翻译与政治和出版间的关系、翻译者与出版者、读者、任务部署者间的角色关系、现实意义等，强硬地将西方的翻译研究范式，套在了具有独特历史色彩的中国翻译研究上，抹灭了中国的历史研究重考证、实证第一手材料的本质。如果有人愿意做量化分析，可以把本书中可有可无的引用进行量化分析，其结果肯定是很惊人的。

第四章（“文革”政治话语霸权下的译本特色---翻译的文本变量考察）考察了译本选择（外译中和中译外作品的内容和动机）、翻译策略（翻译形式、遣词造句、加注删改和集体翻译与署名）和译作评论（译本解读和工农兵对译本的阐释）。从历史文本考察的观点出发，这部分是最重的，涉及到的作品最多，也是最难处理的。就当前的这部书稿而言，这部分给人感觉是摘录和罗列历史文本的前言、序言、译者说明等的部分文字，缺少深入的分析、考证和归纳总结等工作既然是要考辨文本变量，那就要求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文本分析，可是在

“文本的翻译形式”部分（2008：102），作者只是提出这个时期的翻译具有节编、节译、选择和转译等，而没有具体挖掘文本，通过文本对比，用一定数目的例证来说明这些翻译形式和策略（策略包括翻译的策划、文本的选择、翻译的过程、译作的出版、读者的接受和译作的影响等）。同样，在“译文的遣词造句”部分（2008：103），也没有深入文本分析，只是拿出几个句子，不痛不痒地说明了一下，反倒是校注中蒋骁华的例证，更具有参考价值，更值得模仿，但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颇为费时费力的。

历史研究中，考证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这部著作中，作者也做了一些，主要在译作的搜集上，而在其他问题上，还略显不足。譬如，在“加注”为题上，作者只是一味地罗列每个译者注都说了什么，这不是读者关注的信息，读者要关注的是这些译者注采用什么方式进行的？是脚注？还是尾注？还是文中夹住？

这样就可以按照这个进行分类叙述各自的演变、发展、特点与当前文革阶段的状况（形式、内容和规范）。加注或曰注释，在中西古籍中早已有之，只是存在形式不同而已。在中国古籍中，加注往往是以略小字号，出现在字里行间，这样的行文规范在清末民初的出版物中还有存在，后来收到西方翻译著作的影响，不但保留了这种夹注，用于较短的说明、补充与前面词语相关的内容或是交代引用文献的页码等，而且还出现了脚注，用于标出所引用作品的名称、出版等信息，但早期这些并没有今天这样的规范程度，带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具体请参见拙文有关胡以鲁、林祝敌等语言学译介中的版式规范信息）。

历史研究中，面对大量的史实信息，要经过考证分析、进行系统归纳和总结的。譬如，作者对文革时期翻译文本中的删除现象进行分析，她采用的是罗列史实信息，将不同性质的内容混在一起（如江青让人删除毛泽东作品中的注释，属于私人恩怨或曰私欲所引起的），不免产生繁杂的感觉，不如将其总结分类阐述。就作者所提供的信息而言，不妨分为三类：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的、以私心为主的和以有伤风化为主的。此外，在“译本的政治化解读”和“工农兵对文学阐释”部分，不妨将其细分为次类，按次类进行阐述、分析和说明，效果会更好，否则有罗列史实的感觉。同时，也影响读者的阅读欲望。

第五章（“翻译的政治”---“文革”时期中国翻译的“本性”探索）探究了“翻译的政治与现实的政治”、“双重权利话语制约下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活动的双重追求和潜在效应”，属于翻译理论研究范畴了。从这部分的论述，能够看出作者的强项在理论研究，而不在历史研究，因而这部分基本上还是很好的，只是“翻译并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纯文字转换活动，而是政治性十分强烈的活动”（2008：137）这一句，如果从翻译史考究或从宗教史考究，最早的翻译行为都多少跟宗教有关系，而且中国的佛教研究，开始也没有什么政治因素涉入，而是后来政治因素才涉入的，为的也都是江山与美人，所以，历史研究著作中针对这样的措辞，是需要谨慎的。

第六章（结语）从“研究回顾总结”、“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翻译的定位”“‘文革’翻译与西方译论：阐发与思辨”和“余论”等角度，对本著作进行了总结性陈述。

从运用理论来看，本著与其说是历史研究，不如说是理论研究，而且是运用西方翻译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意识形态的著作。这部著作中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其西方理论的运用，也不在于其所作的分析，而在于其对这个特定历史阶段史料的挖掘，尽管没有能够严格按照史学研究的范式来做，但这个瑕疵根本掩埋不住其史料的闪光点。总而言之，本著作者能做这个，是对学界的一大贡献，是功能无量的。

参考文献

李晶.中国翻译考察（1966-1976）：后现代文化研究视域下的历史反思[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A Book Review of *A Surve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1966-1976)*

Jia Hongw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and criticizes, in perspective of historiography writing norms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 Surve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1966-1976)*, a newly published monograph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historiography.

Key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histo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historiography writing

作者简介（可选）

贾洪伟（1977- ），男，汉族，黑龙江阿城人，博士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100089）；

研究方向：语言学思想史、语言学典籍译介史、比较语言学等；

Email: george008023@yahoo.com.cn

手机：13488752189